

理想国

imaginator

葛兆光

且借紙遁

读书日记选

1994—2011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葛兆光

且借紙廻

读书日记选
1994—201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且借纸遁：读书日记选：1994～2011 / 葛兆光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495-5291-7

I . ①且… II . ①葛… III . ①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 ① 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566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马希哲

装帧设计：陆智昌

书名题签：鲁大东

内文制作：陈基胜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1270mm×960mm 1/32

印张：10.25 字数：223 千字 图片：69 幅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i
i m a g i n i s t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
想
国

imagnist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Groot 誓言道：「但能適用於人類及民族調查，上古三種文化相映襯，又必以開外人學說為基，倒置則無益。」有二中國學者引述高麗道：「惟是遠地觀念重用，對吾一書，滿堂玉席真係『固執』？Groot 為甚麼不將此點作明確的說明？但這並非是『無根不伐』。是吾之謂也。」一個圓滿的答案。對於理論之外：滿堂玉席，他一毫無其 origin，予是把歷史資料都歸於旁邊，把時間上的空間，完全消滅掉，因此書本得一絕妙的題作。因此前我是以為他是歷史家，而後就不是矣。先是：滿堂玉席；後者：把一切時間已經消滅掉的一個迷途者寫出；最後，要算他：『吾輩人』——這就是寫照了。

他皇帝每三节派使臣到各处巡幸，以察民情。巡幸中曾利用吉凶：如生女，一十八是年夏月，若生男则于次年不祥；若生女，则生第一女中又须知何事？人生世时开始：（1）封拜行后。（2）配祭。（3）便服日。（4）开天宴。（5）闹床铺。（6）购置金银。（7）泥水。（8）选择阴历设置春明灯。（9）府州县置队伍如朝。（10）乞火灰。（11）经开皇基、陵墓。（12）置祭牲品。（13）奉迎社稷。（14）置成帝像。左丘书中陈子游用德性，进见，奏书礼仪。周易以坎宫除履之望卦外，遂引用 Spencer in Historical Naturalis，Valerius Maximus，Dorans in 中国民间传说（The Folk-lore of China）。

Swift & Tennyson from this World to the Next (默思集) Van Eck Indische Gids
Gray 中国; The Chinese (the China Review). Williams, Middle Kingdom. Maria
Edgeworth. Castle-Rockwood 等, 译用世界其他国家之名著如德意法等国, 以译名之中国书籍。
(禁书出版业者言)

左第一部分是總論 (第一部分總論) 又列明了多個人的報告 (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Ethnology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當中人 (Brand, Observations on Popular Antiquities, Customs at Deaths) 這部分詳述了第二章是多方面的 (是多方面的), 又討論了社會主義。指出古物可以到處去。2-3版了幾點。後面又列明了當時的金錢問題, 金錢問題 ("Z. 10月號, / 金錢問題" "Z. 10月號, 金錢問題的說明"). 又列明了指出 ("民族學家, 兩次為民族學家, 但這裏是民族學家, 這是多方面的" (1871-1872) (248-267頁), 又指出 "民族學家, 但這裏是民族學家" (267-276) (267-276)) 又列明了聯合會 "日本民族學會" 與 "法國民族學會" 與 "英國民族學會". 並列明了印度民族學會 "印度民族學會" (282頁), 並引 Van Eek 的 Het Tijdschrift van Nederlandsch India to Collin de Plancy in Dictionnaire Infernal 33 頁人. SSK. 附錄 "印度民族學會" (282頁) (282頁)

图一：读高延书笔记

读弗里德曼书笔记 (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 Fukien and Kwangtung, The Athlone Press of the Univ. of London. 1966, 89页
者: 田村和己, 深圳品文, 译林堂, 1995), 弗里德曼(1920-1975)又有中国东南部的家族组织一书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出版时间: 1958), 该书即专论福建、广东两省(暨山海关以南)的情况。其研究方法有三: (一) 考古学(孙树芳、小浪底等), 特别强调在研究历史与社会分析角度; (二) 通过研究对家族进行层次层次, 特别考察其与整个社会的连接, 并不将其视为自给自足单位; (三) 历史学(人类学分支)。其结论是: (1) 福建的村落组织, 小浪底的, 特别强调在研究历史与社会分析角度; (2) 无论研究对象处于何种层次, 都考察其与整个社会的连接, 并不将其视为自给自足单位; (3) 在某种程度上将村落看作是“政治单位”, 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而是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来实现的。由于把基督教的组织概念引进到中国, 为通过文字记录资料, 为通过文献、数据, 为沟通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联系提供了途径。特别强调的是: 程序模式是普遍存在的, 但有差别。由于把基督教的组织概念引进到中国, 为通过文字记录资料, 为通过文献、数据, 为沟通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联系提供了途径。特别强调的是: 程序模式是普遍存在的, 但有差别。由于把基督教的组织概念引进到中国, 为通过文字记录资料, 为通过文献、数据, 为沟通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联系提供了途径。(以上引文, 第26页-28页)

(Lineage)
本书研究内容: 一. 村落、族群以及宗族 (Clan). 二. 宗族. 三. 社会地位. 政权以及政府.
四. 宗族问题: 1. 风水与祖坟崇拜. 2. 中国“家法”。

本书第一章一开始就指出, 在福建与江西, 有许多共同体, 是由一个男性祖先传下来; 父系制度(男性)以及他们的姓氏(祖姓), 以及他们的妻子构成; 因此, 首先是从居住模式或父系集团区域入手, 然后向“开始世系”(11页), 即“辈份(血缘关系)-种姓(居住地)-即姓”等三个方面的转换, 形成多级村落或聚居点(如“姓氏的分支”)。这一说法, 指出有一些反驳, 证明“姓氏”没有指向, 即各姓氏村落是由多条姓氏线索而互相交织、排列、排列等组成的, 比如有-些单一姓氏村落(如“张村”)其他宗族祠堂, 证明引证的(1)病(2)贫(3)弱小, 出现“混居”、“折衷”之可能(16页), 也有一种情况, 即偏远地区的势力(或有冲突), 把其他部落驱逐或灭掉(18页)。

“中国传统的‘族’, 如果用英文说: 宗族加祖坟为 Lineage and Clan, 而‘宗’与‘家法’也同様。这些词汇词汇在明朝以前问题就很混, 很难确切界定。希望根据 Crook (Croc, H.G. The Beginnings of Bureaucracy in China: The origin of the Hsien, 见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XII, no.2, February, 1964) 最近: 这些, 在中国古代, 是什么, 并不相合于今天: Lineage to Clan. ‘姓是很大, 隶归: 共同集团紧密, 共同团结某些人居住, 但并不一定必须在姓宗: 陈姓就是-陈子(孙), 但是‘民数少, 居未定: 本族, 即‘团体’(Verband)’。(32-

图二：读弗里德曼书笔记

小引

近来读书的风气渐变，不是太实用，就是太草率。实用者好像带了既定目标匆匆到超市购物，从货架上拣了自己需要的那几样东西，匆匆直奔收银台，银货两讫便扬长而去。草率者则仿佛在网络上撒网打鱼，凭了几个“关键词”就漫天钩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串起来就算，全不顾前后左右语境。在这个重量胜于质量、速成优于沉潜、急躁多于从容的时代，不要说“静夜远钟，伴他青灯古卷”，就连“凭几听雨，任我神游书卷”，都早已成了遥远的往事。

不是批评别人，也是自我检讨。这三十年间，自己也曾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风气下做所谓学术，读书时也不免有实用和草率的毛病。不过，好在当年毕竟读的是古典文献，专业需要逼得自己不得不慢慢地在故纸堆中逡巡，后来做思想史，思想加历史，也让自己不得不心思索，在东洋西洋资料杂书里爬梳。毕竟进入学界已三十年，也算是认真读了若干本书，至今仍不习惯在网上快速钩稽，还是要用笔（或电脑）记录读书心得。多年积攒下来，有手钞的卡片，有成本的笔记，也有电脑录的电子文本。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读书，总是要写一些文摘或札记，也偶尔作一些提要或心得，这些文摘、札记、提要和心得，又常常是混杂在日记里面的，这使我的日记既不像有意留作证据的历史，也不像完全私密性的档案，倒像是一个资料簿子，甚至于很多时候我写论文，还得回头去翻检日记，从中寻找资料、线索和思路。

流年不利，2008 年 4 月起，因视网膜脱落接连几次手术，手术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出了问题的左眼不便多看电脑，勉强用右眼读书，所以，常常自嘲是“一目了然”或“只眼独具”。这使我不得不回头，再次以纸笔写札记作摘录。当我重新用纸笔写读书笔记的时候，才再次感受到旧时的读书滋味。我想，滋味与速度常常恰成反比，就仿佛品味大餐与果腹快餐：只有简帛而没有印刷术的时代，人们只好钞书，这时读的书不仅记忆深刻，常常能读透纸背的意思，背书成了常见的方式，或许并不曾刻意，却往往能过目成诵；等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书来得容易些子，人们常常买书，书肆成为知识渊薮，藏书楼成了知识仓库，不再畏惧知识化为烟云，需要记忆的只是考试内容，遇事再查书成了常见的方式；等到了铅字时代，方便的图书馆和分科的学科制，让人们各扫门前雪，只需管一亩三分地，似乎连查书都各自划定了畛域，懒得越境也懒得旁骛。现在更好，有了互联网，有了 WiFi，纸笔便束之高阁，不要说背，连读都懒得读，遇事便乞灵电脑，考索则拜托网络。有一个学界朋友写了几卷本的大书，据说，文献多来自虚拟空间，成书时连网络痕迹都懒得抹去，一任它在那里作奸犯科。

收在这里的，是 1994 年到 2011 年间十几年来读各种杂书所作的笔记和摘钞。三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求学，曾被专业要求模拟《四库全书总目》，要对所读书作六百字的提要，当时觉得真是枯燥也很没意思。但现在回想，这一近乎刻板的训练，让我至今总是习惯于对书作“撮要”、“概述”和“摘录”。虽然如今年过花甲，但仍然要写这样一些半是摘录、半是提要的文字。毕竟人脑不如电脑，尤其老之将至、记忆不佳的时候更是常常借摘录强

化记忆，借重读这些文字，提醒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些曾经涉猎的知识、感想和线索。

需要略作说明的是，下面这些有关读书的笔记，为学术研究而专门阅读史料的札记、摘抄和评论并不在其中，大多是专业之外的泛览和胡看。实际上，我最大化时间、读得最多，也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是最认真的，恰恰是并不收在这里的那些古文献，包括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文献。所以，应当说这里收录的读书“日记”，恰恰记下的多是并不用心读的“闲书”。

不过，这些闲书的阅读，也是一个以学院中学术研究为职业的人的业余爱好。职业的学术研究，照某些人的说法，应当是“荒江野老”的寂寞事情，需要人至少像董仲舒那样“三年不窥园”，可是，像我这样活在红尘里的人却无法如此。《老子》四十七章曾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但那是太高明而超越的人，所以，世俗的我也会偶尔从象牙塔中，想着拿个板凳垫脚，找个窗户出气，往外望上一望。于是，浏览的杂书成了眺望的窗户，本该坐冷板凳的人，也像《封神榜》上说的“土遁”或“水遁”一样，借了这些印刷的纸张，溜出去长长地透一口气。想到这里，便瞎取了一个书名，叫做“且借纸遁”。

以上这些闲话，就权当“小引”。



2013年6月28日于上海

目次

小引

1994

陈荣捷《近代中国的宗教趋势》(1) / 泽田瑞穗《地狱变》等四种 (3) /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5)

199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7) / 沈曾植《沈曾植诗集》(9) /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10) / 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2) / 郑孝胥《郑孝胥日记》(14) / 殷海光与林毓生《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16) / 林传甲《筹笔轩读书日记》(17)

1996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

1997

埃里亚德《世界宗教史》(21) / 福山《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23) /
傅柯《规训与惩罚》(25)

1998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27) / 詹京斯《历史的再思考》(28) / 华琛与
罗友枝《中国死亡礼仪》(29) / 高延《中国宗教系统》(32) / 弗里德曼《中
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36) / 戴思博《女のタオイスム：中国女
性道教史》(40) / 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42) / 孔飞力《盗魂
者：1768年的中国妖术恐怖》(44) / 刘潞、崔永华编《刘大年存当代学
人手札》(46) / 诺夫乔伊《存在的大链条》(48) / 林毓生《思想与人物》
(50) / 鄂兰《极权主义》(51) / 酒井直树《日本思想という問題》(54) /

Steven Best 和 Douglas Kellner《后现代理论——批判的质疑》(56) / 以赛亚·伯林《哲学与人生：以赛亚·伯林访谈录》(59) /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61) / 加尔布雷斯《权力的剖析》(63)

1999

H. Stuart Hughes《意识与社会》(64) / 利奥塔《后现代的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66) / S. 肯德里克等编《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68) / 渡边浩《东アジアの王权と思想》(70) / 江上波夫编《东洋学の系谱 (1)》(72)

2000

哈维尔《哈维尔选集》(75)

2001

萨义德《东方学》(77) / 池田秀三《自然宗教の力》(79)

2002

陈毓贤《洪业传》(81) / 寇克《新疆地理宝藏记》(83) / 芭芭拉·塔克曼《从史著论史学》(86) /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88) / 梅奎尔《傅柯》(91) / 劳弗《伊朗与中国——古代伊朗与中国之文化交流》(93) / 丹尼尔·布尔斯丁《隐藏的历史》(95) / 周质平《胡适丛论》(97) / 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99) / 鲍默《西方近代思想史》(100) / 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103) /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106)

2003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07) / 简繁《刘海粟传》(113) / 李汉林《百

苗图校释》(114) / 宫崎市定《宫崎市定全集》13册《明·清》(115) / Morris Rossabi 编 *China among Equals* (117) /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118) / 许烺光《边缘人——许烺光回忆录》(119) / 彼得·李伯庚《欧洲文化史》(121) / 克利福德·纪尔兹《地方知识：诠释人类学论文集》(123) / 王尔敏《明清社会文化生态》(125) / 吴蕙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127) / J.B.Harley、David Woodward 编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第二卷 (129) / 伊佩霞《帝制中国的儒家与家礼》(130) / 卜正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132) / 贾志扬《宋代中国进学的荆棘之门》(134) / 黄才贵编《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135) / 武内义雄《中国思想史》(137) / 汪荣祖《史学九章》(139) / 释东初《中日佛教交通史》(141) / 中研院史语所编《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144) / 太虚《东瀛采真录》、《寰游记》(146) / 赫维茨达拉《来自远方的拷问——哈维尔自传》(148) /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150)

2004

孙本文等编著《中国战时学术》(154) / 佐伯富、羽田明、山田信夫、布目潮凧合编《东洋史》(155)

2005

勒华拉杜里《新历史(历史人类学入门)》(157) / 小島祐馬《中国思想史》、《古代中国研究》(158) / 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160) /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162) / 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163) / 蒙文通《古学甄微》(166) / 大久保良峻等编《日本佛教の研究法》(168) / 罗兹·墨菲《亚洲史》(169) / 费正清《中国新史》(170) / 许烺光《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化》(172)

2006

石田幹之助《东亚文化史从考》(173) / 福井文雅《汉字文化圏の思想と宗教》(174) / 彼得·柏克《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176) / 童书业《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180) / 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181) / 池内敏《“唐人杀し”の世界——近世民众の朝鲜认识》(184) / 桑原骘藏《桑原骘藏全集》(185) / 林满红《晚近史学与两岸思维》(191) /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3) / 秋山谦藏《东亚交涉史论》(197) / 哈罗德·伊萨克《族群》(199) / 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200) /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202) / 本田实信《蒙古时代史研究》(203) / 玛利亚·露西亚·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205) / 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206) / 和田清《东亚史论叢》(208) /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10) / 园田一龟《鞑靼漂流记》(211) / 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212) / 陈雯怡《由官学到书院》(216) / 中研院史语所编《“从医疗看中国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19) / 川添昭二《蒙古袭来研究史论》(221)

2007

姜在彦译注《申维翰〈海游录〉》(223) / 松浦章《江戸时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225) / Hilde De Weerdt :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229)

2008

宫崎市定《谜の七支刀》(231) / 韩明士《道与庶道》(233) /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235) / 宫纪子《蒙古帝国所出之世界地图》(236) /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239) / 牟润孙《注史斋丛稿》(241) / 宫崎市定《宫崎市定自跋集》(242) / 季镇淮《司马迁》(248) / 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250)

2009

沈刚伯等《汤因比与历史》(252) / 沟口雄三、池田知久、小岛毅《中国思想史》(253) / 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255) / 艾尔哈特·艾普勒《重返政治》(257) / 保罗·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258) /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260)

2010

连清吉《日本近代的文化史学家：内藤湖南》(262) / 陈冠中《盛世》(264) / 陈学霖《宋史论集》(266) / 樱井清彦、菊池诚一编《近世日越交流史——日本町、陶瓷器》(268) / 安丸良夫《日本の近代化と民众思想》(269) / 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书信)(272) /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274) / 野间潜龙《明代文化史研究》(276) / 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278)

2011

埃里亚德《世界宗教理念史》(280) / 姚从吾《历史方法论》(284) /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286) / 李静旻《一个中国，两种威胁》(290) / 南博《日本人论》(291) / 李则芬《宋辽金元历史论文集》(292) / 德里克《毛泽东思想における近代と反近代》(293) / 窪寺紘一《东洋学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时代》(294) / 赵鼎新《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297) / 鲍绍霖《文明的憧憬》(300) /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301) /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305) / 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307) / 色川大吉《明治精神史》(308)

后记 (310)



陈荣捷

《近代中国的宗教趋势》

陈荣捷 (Wing-tsit Chan) 的 *Religious Trends in Modern China* 这本书，英文版是 1953 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的，1969 年又由纽约的 Octagon Books 再版。日文版则是福井重雅翻译，由东京的金花舎出版，题为《近代中国宗教の足跡》，我看的是日本人的翻译本。在印象中，一直以研究儒家学说著称的陈荣捷先生居然写了有关佛教史的著作，这让我很意外，更加意外的是，这部书不仅比起尉迟酣 (Holmes Welch) 三卷本《中国佛教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Chinese Buddhism 1900–195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973) 来，脉络更加清晰，就是与一些晚近才出版的国内有关现代佛教史的书相比，似乎也好得多。

此书的第一个好处，是它在分析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变化历史时，不是按照人头、著述和机构设置章节，而是用了一些很好的主题作为架构，如“实践：从净土教之形式主义到敬虔主义”，“法仪：从戒、定学到密教之学”，“佛典：从汉译本到巴利文、藏文本”，“姿势：从仪式的施行到宗教之表明”，“指导力：从佛教僧侣到在家居士”，“前途：从来世观到现世观”，一共六个领域，把现代佛教之重点取向都清晰地呈现出来，如现代中国佛教在仪轨上对密宗之学的兴趣，在经典上对巴利文、藏文佛典的重视，在重要成员中居士佛学家的增加，确实是很重要的历史变化；二是它在分析现代中国宗教时，颇有一些说法相当精辟，如第四章说“三教”，就说“把中国人所信仰的宗

教区分为儒、道、佛三教，不如改为大众阶层和知识阶层两个层面的信仰为好。W. E. Hocking 教授曾把东方宗教性信众分为僧侣、在家的神秘论者、学者、一般平民四类，但是在中国，第二类不存在，其余三类则可分为大众阶层与知识阶层。这里所说的大众，即中国占了百分之八十五的有迷信而无教养的人，而知识阶层则包括文化人以及有一定学识的农民渔民或者虽然不多用语言，同样地位卑贱却常常发挥伟大智慧的人”（144页）。

当然，陈观胜《佛教与中国社会》一书，亦值得注意。

（1994年11月23日）